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一种国家治理的视角

■ 罗许成 著

本书以国家治理为理论视角，基于“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互动机制，分析和总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成果。

新型国家政权基石的确立、政党推动型国家政体建构模式的巩固、国家治理方略的形成、国家职能的现代转型、国家发展战略的确立、国家的民族化建构的进展，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以国家治理为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形态。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成果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一种国家治理的视角

■ 罗许成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一种国家治理的视角 / 罗许成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308-06937-3

I. 全… II. 罗… III.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
中国 IV. 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1870 号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一种国家治理的视角

罗许成 著

责任编辑 田 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力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16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937-3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导 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1)
——一种国家治理的视角	(1)
一 研究主题	(1)
二 分析框架	(2)
三 阐释体系	(6)
四 研究方法	(9)
<hr/>	
第一章 全球公共性、全球治理与民族国家	(11)
——全球化背景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的国家实践	(11)
一 全球化:何种性质的世界历史进程	(11)
二 全球化中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面临的挑战	(16)
三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的国家实践: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	(23)
<hr/>	
第二章 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	(38)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8)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家治理的新视界	(39)
二 理论的实践转换: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和建构	(44)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	(48)

第三章 公有制、社会秩序与人民利益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基础的新基石	(57)
一 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基础在于社会	(58)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基础建设经验：革命阶级的联合	(68)
三 全球化中的国家政权基础：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的新基石	(77)

第四章 民主、高效与廉洁

——政党推动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政体建构理论的新视野	(95)
一 无产阶级国家政体建构的逻辑：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政党	(96)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建构：政党推动型建构模式	(104)
三 当代中国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民主、高效与廉洁	(121)

第五章 德治、法治与治国必先治党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逻辑	(137)
一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民主、制度与政党治理国家	(137)
二 全球化中的国家治理：在制度、效率与价值之间	(151)
三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新成就：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	(162)

第六章 管理、服务与新型国家安全观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新发展	(177)
一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与实践	(178)
二 全球化中的国家职能：分化、整合与现代性变革	(192)
三 当代中国国家职能理论的新发展：管理、服务与新型国家安全观	(206)

第七章 跨越发展、创新发展与国家的科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的新战略	(220)
一 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规律、原则与方法	(220)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理论:道路、理念与战略	(224)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理论:最新成果	(231)
第八章 利益、主权与认同	
——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的新进展	(235)
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国家的民族化建构	(235)
二 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利益、主权与认同	(250)
三 当代中国的民族化建构:创造性实践与创新性理论	(264)
结束语:走向社会治理进程中的国家理论	(283)
主要参考文献	(288)
后记	(295)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全党的核心地位，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社会和谐文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人民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文稿如要取名具

人生选择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和改进自己。

导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全球化作为一种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社会历史现象，已经成为多门学科研的重要对象和分析问题的重要概念、切入点或背景。而且，在全球化所引起的各种争论中，关于国家的地位、主权和利益等恐怕是最富争议的问题了。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还需要国家，还需要不需要一种国家理论。在全球化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何以可能？我们又该如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改革开放 30 年来，尤其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党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何发展意义？这些问题必须放置到全球化的背景中，以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加以审视。

第一章 研究主题

一 研究主题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我国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改革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壮大国家的综合国

力。当代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此过程中,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念,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层面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及时、全面、系统地从国家理论层面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当代系统建构的一个紧要的任务。这个任务的紧迫性还在于国外各种国家理论的复兴及其所展示出来的理论优势。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显得尤为突出。密里本德、列菲弗尔、阿尔都塞、普拉查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张全面检讨并创建或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或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去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形态,即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国家理论。这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新工具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资本逻辑学派、系统分析学派、生活世界理论、国家自主论等。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展示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如今又出现了种种“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国家理论形态,如制度分析的国家理论,组织实在论(Organizational Realism)国家学说等等。这些“新”和“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虽然没有真正达到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目的,但却大大拓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视野,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分析框架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产生了近似近代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分离的历史现象,这使得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似乎可以成为分析当今中国国家问题可资借鉴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然而,国内市民社会论者在探讨中国政治问题时,曾一度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国家的批判传统同具有西方经验特征的“市民社会”粘连起来,并暗含着对市民社会的推崇和对国家的否定。本文将对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合进行批判,指出其对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具有严重的误导作用。

了西方政治现代化模式及其发展道路具有普遍性的预设,^①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市民社会”的呢?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黑格尔的一种不成熟概念,它无法准确表达和说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因而市民社会的概念也就被“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等更为准确的概念所代替。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由于国家批判不可能只限于对国家的一般政治考察,而必须探究国家问题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因此,纯粹的政治批判不可能使国家理论有突破性进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把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部分分割开来是不符合实际的和武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才将关于社会与国家的政治之论拓展或者说上升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哲学之论,把作为对政治解放之超越的“人类解放”视作自己全部理论批判的终极目的。如我们所知,正是首先通过对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解剖,马克思创立了他的唯物史观,而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决定国家”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理论视野和批判传统,它超越了一般的“市民社会”分析方法。

所以,对中国的国家问题的分析必须祛魅“市民社会”,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情势和需要,在国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国家实践的现代性诉求之间构建一种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相应理论预设的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民主化、自治化要求消肿政府的职能,另一方面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化、专业化、系统化又要求调整并强化政府的管理职能。在这种情形下,西方的国家治理愈来愈陷入市场的失效和国家的不足的两难境地,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具有“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性质的放任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国家批判分析框架,似乎都已不足敷用了。有鉴于此,新保守主义政治热衷于以公共治理机制来对付市场的失效和国家协调的失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罗西瑙(J. N. Rosenau)、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的建构下,“治理”逐渐成为一种颇具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① 参见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载张静:《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302页。

其实,在元意义上,治理首先是作为一种指称政治活动或政治行为意义的词语,语义大体上是指借助权威使“乱”的状态变成“治”即有序的状态。在国家政治活动上,作为政治学科中的一个政治行为范畴,治理通常是指在国家政治系统的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对政务或公共事务作出有效的安排,以达到维护统治秩序和维护既定政治价值的目的。就此用法而言,治理一般被认为是国家作用的运转问题,即国家治理问题。但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其涵盖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治理”与“统治”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治理”源于“统治”,又发展了“统治”,其基本内涵也在与“统治”的比较中得到深化和确认;“统治”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以前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权力(公共权力)管理社会、维护政治统治的主要方式,而人类进入民主制度时代以后,国家权力垄断公共事务的“统治”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治理”概念逐渐被界定为: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管理活动或协调互动的过程,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①换句话说,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从“治理”理论的起源以及目前研究者对“治理”的各种界定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理出“治理”所能或所欲涵盖的基本哲学要义:其一,“治理”含有一种浓厚的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吁求,是市场分权使然,因而,彰显出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其二,“治理”依然要依赖政治权力,甚至国家政治的强力,这是“治理”界限和责任得以界分的最终根据;其三,“治理”以民主、协商和合作为基础,所以,治理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治理”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要不要制度化问题上,西方国家治理理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其四,“治理”是因传统的国家治理效率低下或国家治理失败而兴起的。^②所以,追求治理效率的最大化与追求治理的科学性(技术性)之间往往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又往往以牺牲治理应有的价值性为代价。这些基本哲学要义表明:“治理”依然可以界定为国家治理,其实质是传统国家治理的现代形式,只不过这种“治理”在行为上试图排斥国家的权威垄断,在话语上试

^① 参见《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 页,转引自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 年第 5 期;罗西瑙:《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② 参见程寿:《公共治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演进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攀登》(哲社版)2004 年第 6 期,第 36—40 页。

图排斥政治学知识中“统治”的独霸地位,它以多中心治理、民主自治、宪政改革等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国家治理。

然而,西方这种国家治理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暗含的是一种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建构市民社会,进而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政治预设。这种政治预设和社会诉求使西方治理理论本身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治理实践上的非政治化倾向问题、治理目标上的公平与效率失衡问题、治理的责任缺失问题、第三部门失效问题,等等。^① 所以,确立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分析框架,不仅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实际,而且也绝不能没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逻辑预设。

中国的国家治理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决定国家的逻辑,它符合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实际和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类似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变化。第一,社会资源的占有与控制已逐渐呈现多元化态势,社会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发展出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形式。第二,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表现为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言论权、出版权、隐私权及其他权利的状况较以前有所改善。第三,随着从旧体制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的发展壮大,在政府行政组织之外开始了民间社会的组织化过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非营利团体和非行政化的营利性经济组织日益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社会主体。社会的变化要求国家权力的运行在保障社会秩序的有效供给和社会资源的有效调控的基础上,充分反映社会的利益和需求,逐渐进行国家权力的结构、功能的调整,努力提高国家权力的运行效率及其服务水平。实际上,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某种治理性转向。这种转向突出地体现在国家权力运行的变化上:一是政治主体凸显公共的特性,国家、政府、执政党和政治权力执行者开始逐渐摆脱其私域特征,从代表阶级的利益到代表社会普遍利益;二是政治理念的公共价值取向,即国家政治生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开始逐渐确立起了民主、法治、公正、服务、效率、负责等现代公共价值理念;三是政治权力有了

^① 参见程寿:《公共治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演进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攀登》(哲社版)2004年第6期,第36—40页。

一定的“公意”内涵，即强化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实行行政责任追究制，拓展社会对政治权力的公意表达和同意的范围和渠道。国家政治生活的这种实质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状况。

这种转向表明，我们确立的国家治理分析框架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分析框架，而不是国家主义的分析框架。^①社会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天然对立物，^①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因而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分析指的是坚持国家职能的社会化、国家权力运行的人民化和国家政治目标的“人本”化（以人为本）的分析。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逐渐实现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调整的过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职能逐步调整或过渡到以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社会为主的社会职能上来。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从代表统治阶级利益转变到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了，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从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到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的社会化目标的过程。由此可见，国家治理分析框架是一种国家向社会过渡的分析框架，其理论预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一种即区别于又高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过渡”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根本题旨应该是作为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发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

三 阐释体系

从理论建构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从未被系统地理论化过。从马克思本人起到所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政治著作，大多是

^① 郭道晖先生指出：“人们经常谈论社会主义，把这一概念同资本主义相对立，这固然不错；殊不知，之所以称为‘社会主义’，还在于它也是同国家主义相对立的。后者主张国家至上，国家决定一切；前者则主张国家应以社会为基础，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最终要废除或消亡。”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02 页。

特定历史事件和特定环境的产物，他们对国家理论的探讨也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断的，而且往往是其他著作的一部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密里本德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的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需要仔细“辨认”，才能够发现。^①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菲弗尔也说：“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国家理论，也就是想寻找一种连贯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反之，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国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国家问题是马克思经常关注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国家的一系列论述和一种显然已经确定了的方向。”^②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最杰出的继承人没有系统建立国家理论却是事实，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片断材料中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这将是一个浩大而又十分需要精力和智慧的解释和建构性的工程，显然是本研究所力所不逮的。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家问题的浩繁的论说中，归纳出一些国家理论的基本主题或领域，如国家的起源性质作用、国家的政权、国家的形式、国家的职能、资产阶级国家问题、过渡时期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的消亡等问题。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也已经开拓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国家的发展、国家的自主性、国家的治理、国家意识形态、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国家的能力、国家与资本、社会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等论域。因此，本研究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实际，选取国家的政权基础、国家的政体建构、国家的治理、国家的发展、国家的职能变革、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等方面，总结和阐释全球化背景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

^① 参见密里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 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杰索普（Bob Jessop）说：马克思“没有提供一种与《资本论》的见识和严密性相当的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理论分析。他论国家的著述，由一系列片段的、不系统的哲学思考、当代历史分析、报刊文章、偶发事件的评论组成”。杰索普还论为，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葛兰西（Bob Jessop，“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al，1977，p. 354）。

围绕着这一主题,本书除导论外,由相互联系的八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是在述评全球化的实质、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挑战的基础上,总结和阐释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实践与创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依托,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以国家职能调整为目的,加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以执政党建设为核心,提高中国国家主权能力和执政能力;以开放合作为原则,积极参与全球化维护国家利益。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笔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建设、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上的价值一致性,“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合乎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社会本位主义”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第三章着重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新基础。首先探讨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基础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基础的历史变迁,指出必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重视国家政权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利益结构、社会秩序结构等方面的基础建设,指出“公有制为主体”、“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两个范围的联盟”和“稳定、有序与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的新基石。第四章,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政体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无产阶级国家的政体选择和改革的思想旨趣是民主共和、人民当家作主和“议行合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推动型国家政体建构模式既是现代政党政治的逻辑,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逻辑,其最新理论成果有:科学定位党的权力;形成了以先进性、执政能力、党内民主的建设为内容的党的建设理论,提高了政党推动国家政体建构能力;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体理论。第五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逻辑,指出政党治理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治理的关键。在全球化背景下,治理的制度化、有效性和价值性是当代国家治理的三个基本“中轴原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新逻辑是“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治国必先治党”,这是确保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有效性和价值性的基本方略。第六章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变革的经验教训,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职能变革的一般特点和一般规律,指出当代中国国家职能理论的新成就:系

统国家职能观、新型政府职能观、初见端倪的“新型国家安全观”。第七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的思想,指出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艰苦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概括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国家发展的理论成果: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理论、国家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国家创新理论、新型工业化理论。第八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的基本思想,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政治化与国家民族化相互建构的产物,而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的建构总是围绕着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和国家认同来展开的,揭示了当今国家建构的实质,并从国家的利益、主权和认同三个方面总结和阐释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对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成就。最后,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由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管理)的理论。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范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是给定性的,而是解释性的,因此,为了科学地、如实地概括和阐述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的国家实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就首先需要对我们所选取的几个主要理论论题或论域,作一些必要的建构性的阐释。这种建构性的阐释,一方面自然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是依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需要,如实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做到理论的建构既有明确的理论依托,又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所以,对于国家的政权基础、国家的政体建构、国家的治理、国家的职能、国家的发展、民族国家等几个主要论域,我们首先是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然后力图以全球化的理论视野审视当代国家实践和国家理论,如此,我们才能比较准确而公允地概括和阐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论贡献。

规范分析和经验分析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前者是一种应然分析,主要关注“应该是”的问题,强调政治研究的价值标准,并用以判断各种政治现象、政治行为、政治形式的价值,对它们作定性分析;后者是一种实然分析,主要关注“是什么”的问题,强调以实证的事实与数据来验证一般的理论和原则,经过验证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本研究的出发点是试图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政策、策略和经验,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层面上作一定性分析,阐明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意义,总结自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的国家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贡献,这使得本研究必然涉及规范分析。同时,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层面上的任何价值判断和规范分析要必须紧密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全面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丰富的实证事实和经验材料,在对当代中国的国家实际政治运行状况的描述和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使这一判断具有经验的、可验证的基础。

第一章 全球公共性、全球治理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背景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的国家实践

全球化是总结和阐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国家理论新发展的背景和切入点,因而我们需要从理性的高度公允地揭示全球化的性质,以及全球化给国家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一具体学科意义进行描述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依然为我们认清全球化与国家问题的理论基础,惟其如此,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的国家实践及其理论成果才具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意义。

一 全球化：何种性质的世界历史进程

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从总体上说,是一个人类活动和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人类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和深化的过程。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与传播,世界生产、贸易、服务日益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逐渐趋于形成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全球性的经济格局。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迅速引发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世界化趋势或过程,并在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形成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浪潮。

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引发人们对全球化实质的研究和探讨。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可以经验到的事实：全球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全球化的概念中描述从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到因特网的所有事物。并且，二战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持